



韓國電影的百年一刻：跟著《寄生上流》走上奧斯卡

●王君琦／國家電影中心執行長

●孫文臨／新生代影評人

本屆奧斯卡最大贏家《寄生上流》打破多項歷史紀錄，不僅是第一部闖進奧斯卡的韓國電影，也成為奧斯卡創辦至今首部獲得最佳影片的外語電影。這是一個連黑澤明、柏格曼、楚浮、高達、費里尼、李安等諸位電影大師都未能獲得的成就，一舉超越多次問鼎奧斯卡的法國、西班牙、日本、義大利等國，導演奉俊昊引領韓國電影寫下不可思議的歷史新頁，同時韓國電影也為世界帶來了奉俊昊這一位無限創意的電影人。

這其中當然有一點點運氣，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但《寄生上流》成為奧斯卡最大贏家絕非偶然。俗話說「機會留給準備好的人」，這部電影不是橫空出世的奇蹟，而是韓國電影多年來積累的百年一刻。

一百年前——1919年正值朝鮮日據時期，朝鮮劇作家金陶山在旅日期間被連鎖劇所啟發，返回朝鮮後自編自導自演了連鎖劇《義理的仇討》，問世後大獲成功，被視為第一部韓國電影，後世將這部電影上映的10月27日定為「韓國電影日」，《寄生上流》問世的2019年正好是「韓國電影一百年」，這一百年來韓國電影經歷了諸多挑戰，卻能一一克服，最終開闢了自己的一條道路。

單一民族的國家卻能創造出多元類型的在地電影

談到韓國，經常有人說韓國人愛國意識強盛，愛用國貨、支持國產電影，而這樣的民族主義色彩，或許與韓國是一個單一民族國家有關，朝鮮半島從西元918年高麗王朝統一到1910年李氏朝鮮遭日本併吞，統一將近一千年。

被日本殖民以後，韓國人為了團結抵抗日本，凝聚民族意識，1926年羅雲奎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阿里郎》，暗示殖民地人民對獨立的渴望，獲得空前成功，掀起民族電影熱潮，日本殖民政府深怕人民反抗，逐步加嚴的電影審查制度，禁止含反抗思想的電影上映，導致韓國電影進入低潮。

1935年的在韓國上映的電影中69%屬於日本電影、27%為歐美電影，韓國本土電影

僅有4%，一直到1945年二戰結束後才獲得短暫解放。然而，1950年美蘇兩強的韓戰又把尚未癒合的朝鮮半島捲入戰火之中，戰爭不僅導致電影產業沒落，《阿里郎》等經典電影的母帶也因而毀壞或遺失。

冷戰期間，美國為首的西洋電影成為市場主流，占韓國電影市場的八成以上，《北非諜影》（1942）、《羅馬假期》（1953）等西方作品對韓國電影復興產生許多影響。1955年，李奎煥改編古典文學的《春香傳》（1955）帶動歷史劇熱潮，韓滢模的《自由夫人》（1955）則讓通俗喜劇興起，同時也出現恐怖片、文藝片等各式各樣的類型電影出現。在形式模仿西方製作，故事則源於韓國本土，知名韓國導演金綺泳就是在這樣的年代拍出經典電影《下女》（1960），這部取材自真實殺人案件，卻堪稱南韓影史最怪誕的現代寫實主義作品。

奉俊昊過去曾在受訪中提過，他相當喜歡金綺泳導演的電影，也深受影響，韓國觀眾也發現，金綺泳導演的《下女》與《蟲女》都有使用階梯的空間性來隱喻人物的轉變，這樣的隱喻被借到了《寄生上流》中成為山上豪宅與半地下屋更大型的象徵符號，而電影中地下室所住的男子，首次出現時所食用的奶瓶，據說也源於金綺泳作品《肉食動物》中，指涉無能父母的道具。

不只是保護主義 南韓電影因撤掉保護才開始進步

每當談到韓國電影政策，最常見的說法就是韓國政府以保護政策扶植國內文化產業，這確實沒有錯。韓國政府為保護本國電影，1954年韓戰結束後修改稅法，免除國產電影的入場票稅，並在1959年實施「國產映畫製作獎勵和為了映畫娛樂純化的補償措施」，以政府的力量扶植政府認定的優秀電影。

韓國政府於1962年進一步頒布《電影法》，實施外國電影進口配額制度，規定進口電影數量不得超過全年發行總數的25%，且一年最多只能進口二十五部。片商每進口外國電影，都要依規定繳交回饋金，並以這筆資金在1972年成立「電影振興會」（即電影振興委員會），支持國內電影產業。《電影法》也制定國產電影的銀幕配額制度，規定戲院的本國電影最低的上映日數不得低於三個月。

《電影法》確實起到保護韓國電影產業的作用，然而該法也規範電影公司的規模，一年製作不到十五部電影的電影公司會被取消資格。事實上，《電影法》由軍閥朴正熙實施，藉此關閉許多獨立電影公司、封鎖國外電影，相當程度限縮言論自由，破壞市場機制，讓電影淪為獨裁者的宣傳工具，有一派學者稱為韓國電影的黑暗時期。

這段韓國電影黑暗期，在朴正熙之女朴槿惠任總統期間，官方論述將其美化，導致歷史詮釋出現偏差，《電影法》的頒布對韓國電影發展影響深遠，這樣的影響是好或壞、是限縮或保護，或許正如歷史學家克羅齊所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得看當



代如何詮釋。

1979年朴正熙遭暗殺，1980年另一位軍閥全斗煥在光州事件後掌權，全斗煥政府為取得美國支持，1985年開始放寬對外國電影的限制，廢止了「優秀電影獎勵制度」，1989年開始進口外國電影不必經過政府批准和審查，1994年廢除了外國電影進口拷貝的限制。韓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廢止《電影法》，在公平貿易的規範下導致好萊塢電影全面入侵，對當時的韓國電影產業產生了莫大衝擊。

1998年林權責、姜帝圭、金基德、李滄東等電影界知名導演為此發起了「光頭運動」，認為政府在韓國電影成熟前，不得草率廢除國產電影的保護措施，將會造成好萊塢電影壟斷的情況。

這場示威遊行發揮了成效，讓政府決定保留國產電影銀幕配額制度，這場運動不只展現了韓國電影人的團結，也顯示了韓國人對於國產電影的情感聯繫，當年二十九歲的奉俊昊剛投入電影產業不久，也在光頭抗議活動的人群當中。

韓國電影人用作品與行動，希望說服了韓國民眾，「只有韓國電影產業才能拍出屬於韓國的故事」，要求以政策將電影保存下來。這場行動擋住了政策，也提升了韓國人民對本土電影的信心與情感，隔年姜帝圭導演的《生死諜變》，就以力抗西洋好萊塢做宣傳，票房一舉超越了《鐵達尼號》，至此韓國成為了少數本地電影可以與好萊塢抗衡的電影市場。

簡單來說，雖然韓國電影確實經過了長達四十年的保護時期，然而這段保護時期並沒有讓韓國電影進步，真正讓電影品質得以突飛猛進，是在開始放寬限制十年之間，因為面臨了危機意識，韓國電影積極轉型做出了絕佳的回應。這並非只是保護政策，更重要的是，讓韓國電影在適度競爭下逐步跟上國際電影產業的規模，隨著電影產業發展情況，政府也適當調降保護政策的配套。

電影產業的系統性建立：市場、資金、人才缺一不可

近年來韓國電影從《屍速列車》、《與神同行》、《寄生上流》幾乎年年都有佳作，每次好看的韓國電影問世，總會有人問「台灣為什麼不能拍出XXX？」，其實不只是台灣，曾經風靡亞洲的日本與香港，也都有人在問同樣的問題。與其說是我們做錯了，倒不如說是韓國做對了一些其他國家沒做的事。

1993年，韓國首位非軍人總統金泳三就任，當年韓國的年度國政報告中提到「一部《侏羅紀公園》的利潤，比韓國現代汽車兩年賣出一百五十萬輛車還要高」他更留下讓後世津津樂道的名言，「如果迪士尼的營業額能跟IBM並駕齊驅，我們為什麼不全力發展影視產業？」奠定了韓國要以文化立國的政策目標。

金泳三任內有多項影視產業政策，以《電影振興法》取代《電影法》，廢除所有的

電影審查制度，以民間自律的電影分級制度取向。1995年也同時提出「傳播影視產業振興五年計畫」，以加強電視節目的人才、建構節目製作中心、開放傳播影視檔案、支援電視節目輸出為主要策略。

此外，金泳三任內也完整規劃影視教育制度，以韓國電影學院為核心，從培養國人的電影審美到建構專業人才培訓的系統逐漸成型。韓國電影學院中細緻的分工，深知業界所需要的人才與技能，替韓國電影產業提供了源源不絕的人才。

奉俊昊從延世大學社會學系畢業後，當完兵重返校園就是進入韓國電影學院，這才踏入電影創作領域。而國民素質的培養則讓韓國成為近年全球人均觀影次數最高的國家，平均每個韓國人每年進電影院4.1次以上，勝過排名第二的美國3.8次，更比台灣的1.9次高，這讓只有五千萬人口的韓國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影市場。

然而，要建立文化並非一蹴可及，也不是一任總統就能完成，金泳三任內耗費許多預算培養文化產業，並未在當年就看見成果。1998年金大中接任總統，他將韓國文化部改組為文化觀光部，並推出《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整合文化產業政策、版權法規、電影、錄影與遊戲及內容推廣等工作。

2000年通過新版《廣電法》，開放了有線電視產業的經營，以註冊制取代核准制，放寬了企業經營電視媒體的限制，吸引更多民間資金投入影視產業。電影振興委員會的工作也從直接補助電影，轉向媒合企業投資電影、健全影視人才培育制度以及積極開拓國際市場的工作三大重點方針。

無論是扶植文化或拍攝電影，都需要投資大量資金，要發展電影產業不能單靠政府的補助，民間資金的引入讓韓國電影更積極的轉向市場。投資《寄生上流》的CJ集團，前身就是三星旗下的第一製糖食品產業，1953年創立，1996年才投入影視娛樂產業。

《寄生上流》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時，典禮一度將得獎人的麥克風消音，打斷了電影製作人李美敬的感言，他不只是這部電影製作人，也是CJ集團的副董事長，更是韓國文化產業背後重要推手。他曾說過，「我夢想的世界是，全世界的人每週吃一次韓國菜，時常聽韓國音樂，一年看兩次韓國電影。」這段話也放入CJ集團的官方簡介中，不只為賺錢而投資，更為推廣韓國文化而投資。

從人才培養、市場建立、資金引入、多元類型，韓國產業發展百年終於建構了必備的元素，然而他們沒有掉以輕心，仍不停地調整政策方針，讓韓國電影在市場競爭中保持活力。事實上，《寄生上流》的成功，不只是一部電影的成就，更是背後韓國電影產業的百年成果。

2019年亞洲最重要的世界級影展韓國釜山國際電影節推出「韓國電影百年：十部傑作」的企劃，由三十七位評選委員票選出百年來十部最佳韓國電影，其中一部就是奉俊

吳的《殺人回憶》（2003），而對奉俊昊《寄生上流》有直接影響的金綺泳《下女》（1960），也在名單之中。百年十大經典韓國電影另有兩部出自1960韓國電影黃金年代的佳作，一是俞穆賢描述韓戰爆發人民顛沛流離的文學改編電影《誤發彈》（1959年拍竣，但因電檢延至1961年上映），另一則是李晚熙1968年的作品《休日》，但這部片在當年卻因為導演、編劇、製作人不願意屈就於電檢要求修改結局而未能公映，直到2005年韓國國家電影資料館在整理老電影拷貝時，才使這部代表六〇年代韓國現代主義電影精髓的經典鉅作得以重見天日。事實上，釜山國際電影節早於2006年即開始規劃放映韓國早期電影，並且將「韓國電影考古學」設立為常態單元，與韓國電影資料館合作放映數位修復後的韓國電影。去年，韓國電影委員會在釜山舉辦第三十屆東南亞—南韓高峰會（ASEAN-ROK Summit）的導演創意論壇時，除了探討電影政策、電影產業界的創投、製作、發行、觀眾及影展之外，也將經典電影的保存、修復和發行視為重要課題。

以過去積累現在開創未來 電影的保存與修復

由此可見，韓國電影界及韓國政府都相當清楚，韓國電影要能傲視群倫，早期電影的珍貴資產不論是做為當代導演的靈感啟發或是世界認識韓國電影特殊性的參考，都有絕對不可抹滅的重要性。也因此，保存以二十世紀初為起點迄今的電影，並且利用當代數位技術讓這些過去以膠卷拍攝的作品可以重新被看見，遂成為讓當代電影產業可以持續壯大的重要資源之一。韓國電影資料館早在1974年成立之初就開始進行電影的典藏與保存，並且於2007年開始著手將經典韓國電影做數位化的掃描或修復。

然而，在台灣，電影做為影音遺產的重要性卻長期被忽視。1960年代其實也是台灣電影的全盛時期，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66年的統計數字，台灣當年劇情片兩百五十七部的生產總量位居世界第三，其中台語片更佔了總生產量的百分之七十。自1955年第一部三十五毫米台語片《薛平貴與王寶釧》問世，至1970年代末台語片陷入谷底這二十餘年間，共有約兩千多部的台語片，但如今被陸續找回存放於國家電影中心典藏庫房的僅有百餘部，而且為數不少的膠卷被找到時早已因為物理環境的影響而產生酸腐的化學變化。台灣要到1991年將原來的「電影圖書館」更名為「國家電影資料館」後，才開始有系統地進行電影的蒐集與保存，而讓這些被保存的珍稀影像能重現於大銀幕上的數位化計畫則要等到2013年底方才啟動。截至2019（108）年底，國家電影中心完成一百七十一部膠卷電影的高階數位化掃描，四十七部的數位修復影片，其中又有十八部的台語片。以目前國家電影中心所典藏的影片總量來說，實為鳳毛麟角，因為數位修復無論是在人力、技術、和設備上都極為耗時耗力耗錢。以目前國家電影中心數位修復實驗室的量能來說，從膠卷整飭開始到完成一部影片的4K數位修復，至少需要四個月的時間，而修復一部影片的經費則是兩百萬元起跳。儘管政府近年來已經開始意識到影音遺產的重要性，但起步太晚所造成的缺憾，需要政府與民間一起攜手挹注更多的資源來彌補。

《寄生上流》以高水準的工業技術處理了階級欲望的普世題材，但這部片之所以成功還有一個絕對關鍵，就是韓國特色，韓國特色能被如此精準巧妙地掌握與運用，靠的是世代經驗和美學傳承。如果台灣影視作品要透過「愈在地，愈國際」的策略展現台灣特色，來因應全球化市場，如何踩著前人的步伐，回看過去的光影刻痕進一步梳理出人民的情感與記憶及其表達，無疑是我們除了著墨電影政策與產業分析外，不可或缺的一步。◆